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二辑
主编：杨镰

萍踪偶记

陈友琴 / 著 陈才智 / 整理

Pingzong Ouji

中国青年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第二辑
主编：杨镰

萍踪偶记

陈友琴 / 著 陈才智 / 整理

Pi nǎozong Oují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萍踪偶记/陈友琴著;陈才智整理.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12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ISBN 978-7-5153-1182-1

I.①萍… II.①陈…②陈… III.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5732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511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75×975 1/16 10.25印张 2插页 116千字

201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

总 序

20世纪，是人类社会进展最快的世纪。20世纪的通行话语是“变革”。

就中国而言，自进入20世纪，1911年“辛亥革命”为延续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谱系画上了句号，1919年“五四”运动，新文化普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20世纪前50年间，袁世凯“称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北伐、长征、抗日战争……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受到举世关注。此后，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的感受，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20世纪是中国进入现代时期的关键的、不容忽视的转型期，以20世纪前半期为例，1900年，“八国联军”践踏中华文明，举国在抗议中反思；1901年，原来拒绝改良的清廷宣布执行新政；1906年，预备立宪……以世界背景而言，“十月革命”，两次“世界大战”，成立联合国……1911年到1949年，仅仅历时30多年，中国结束了封建社会，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跨越。反思20世纪，政治取向曾被视为文明演进的门槛，“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红，就是黑，一度成为舆论导向，影响了大众思维。

无可否认，在现代社会，伴随社会的进步、发展，中华民族的民主、科学精神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是中国历史最具影响力的事件，

是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中国现代时期的鲜明特点。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过程，提供了真实生动的佐证。

20世纪的丰富出版物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政治意图与具体事件脱节，人文地理著作长期以来未能受到充分关注，然而文学、历史、政治、文化、语言、民族、宗教、地理学、边疆学、地缘政治……等学科，普遍受到了人文地理读物的影响，它们是解读20世纪民主、科学思维成为社会主流意识的通用“教材”。

人文地理纪实无异于在社会急剧变革过程进行的“国情调研”，进入20世纪的里程碑。没有这部分内容，20世纪前期——现代时期，会因缺失了细节，受到误解，直接导致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足。

就学科进展而言，现代文学研究是最早进入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位置的学科之一，《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则为现代文学家铺设了通向文学殿堂的台阶：论证了他们的代表性，以及他们引领时代风气的意义。

与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学史的漫长历程相比，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30多年短如一瞬间，终结封建王朝世系，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现代时期定位的标志。

“人文地理”，是以人的活动为关注对象。风光物态、环境变迁、文物古迹、地缘政治……作为文明进步的背景，构建了“人文地理”的学术负载与阅读空间。

关于这个新课题，第一步是搜集并选择作品，经过校订整理重新出版。民国年间，中国的出版业从传统的木刻、手抄，进入石印、铅

印出版流程，出版物远比目前认为的（已知的）宽泛，《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的编辑出版，为现代时期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树立了传之久远的丰碑。否则，经过时间的淘汰，难免流散失传，甚至面目全非。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与旅游文学、乡土志书、散文笔记、家谱实录等读物的区别在于：

人文地理纪实穿越了历史发展脉络，记录出人的思维活动，人的得失成败。比如边疆，从东北到西北，没有在人文地理纪实之中读不到的盲区。21世纪，开发西部是中国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开发西部并非始于今天，进入了现代时期便成为学术精英肩负的使命：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前往相对落后的中西部，使中西部与政治文化中心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丰厚遗产，共同面对美好前景。通过《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我们与开拓者一路同行，走进中西部，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担他们的艰难困苦。感受文明、传承文明。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不会因岁月流逝、天灾人祸，而零落泯灭。

《20世纪人文地理纪实》是20世纪结束后，重返这一历史时期的高速路、立交桥。

十年沧海寄萍踪

陈才智

《萍踪偶记》的作者陈友琴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已故学者中享年最长者。《萍踪偶记》是他继《川游漫记》之后的第二部游记文集。鉴于目前读者对友琴先生已很陌生，出版物中亦难觅其详细资料，为知人论世，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名字适与钱锺书成为对仗的前辈学者。

陈友琴（1902~1996）先生的前半生，已见拙撰《半载川游寄萍踪》。这里介绍其后半生。1953年，陈友琴奉中宣部之调，就职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组。这一年陈友琴已经51岁。和文学研究所的许多先生一样，一家人住在中关园。文学所自1953年春成立之伊始，就荟聚了一批蜚声遐迩的优秀学者，在郑振铎、何其芳的主持下，酿就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而古代组则是文学所首屈一指的大组，更是名家济济。因为与邓之诚^①住处相距

①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号明斋，室名五石斋。原籍江苏江宁，生于四川成都。曾祖是闽浙总督邓廷桢，协助林则徐查禁鸦片，抗击英军。祖父邓文基、父亲邓小竹，长期在四川和云南作官，也好文史。邓之诚就读于成都外国语学校法文科、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后任《滇报》编辑，1910年任昆明第一中学史地教员。辛亥革命后，积极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和反袁护国运动。1917年任教育部国史编纂处民国史纂辑、《新晨报》总编辑。1921年起，任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并先后兼任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1931年起，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史学教授。1941年冬与洪煊莲等被日本军逮捕入狱，翌年获释。出狱后，惟靠鬻字、典当、借贷以维持一家生活，拒绝替日伪工作。抗战胜利，燕京大学复校，才重新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

不远，所以陈友琴常到邓之诚家去作客，讨教治学的经验。邓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明清史研究，收藏的清代诗集、文集、史集很多，给陈友琴的研究提供了方便。陈友琴很敬佩邓之诚，认为他是一个读书人，治学谨严，学问踏实，知识渊博，乐于帮助志同道合的人。事隔多年，每谈起此事，犹深深感怀于其真诚与亲切。陈友琴认为，邓之诚的遗著《清诗纪事初编》^①是那个时期最有参考价值的成果。《清诗纪事初编》共八卷，是邓之诚晚年根据自己一生先后访得的700余种顺、康时人诗文集整理爬梳而成，著录清代诗人总数多达622家^②，诗2000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不限名家，贵在诗能记史外之事。所有诗人名下都附有相当详细的一个小传，介绍其生平和著作版本，既是一部清代诗歌文献的阶段总结，同时也兼及诗歌史上的相关流变与个体特征。^③

1954年3月1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部长郑振铎与副部长冯雪峰、聂绀弩、何其芳、陈翔鹤等提议，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由作协古典文学部和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主办，在《光明日报》上设置学术副刊“文学遗产”，文学研究所余冠英和陈友琴二人被推为编委。^④这并非虚衔，陈友琴投入了大量精力

①《清诗纪事初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12月第1版；1965年11月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版，利用旧纸型重印，并订正了一部分舛误，编列了一个人名索引，为新1版。

②《前言》、自序等处所说“六百家”为泛言。

③参见卞孝萱《邓之诚“诗证史”的理论与实践》，《燕京学报》新13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又改题《邓之诚与〈清诗纪事初编〉》，收入《现代国学大师学记》，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④1958年年初，《文学遗产》编委会有部分调整，增补了外地学者，陈友琴继续任编委。

参与刊物的审稿和编辑工作。1954年9月,《文史哲》(月刊)第九期发表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看到该文后,给予重视和支持,把问题提到同资产阶级唯心论作斗争和是否“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的高度。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①,号召对俞平伯、同时对胡适的唯心论展开批判。10月底至12月上旬,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八次扩大联席会议,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倾向。在这一形势下,陈友琴也撰写了《俞平伯先生的趣味主义及其他》,刊载于《光明日报》1954年11月7日《文学遗产》28期。11月25日至12月27日,文学研究所又连续召开六次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简论》的会议。内容尚在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方面,如“色空”说,“微言大义”说,“反看”说。结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2月20日,文学研究所进一步对研究方针、任务、工作进行检查。群众指出所内存在“片面强调系统研究,忽视有关现状”,“研究工作脱离政治”,“没有反映过渡时期的历史特点”等倾向。又批评何其芳对老专家片面强调“团结”、“照顾”。这场学术批判,是建国以后政治第一次大规模地介入学术。55年以后,有人评价说:“这一场被纳入政治轨道的学术批判运动,不仅对其后红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品格的失落,学术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沦为政治的附庸。这一场批判,既是被批判者的悲剧,也是批判者的悲剧,对于红

^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34~135页。

学，对于中国学术，更是一个悲剧。”^①但有人说：“这场斗争看似轰轰烈烈、万马千军，实际上刚一排开阵势俞平伯一个回合都没有招架便投降了，交出了一份《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的检讨，说了一句‘我的心情是兴奋的’便完事，只是获胜的一方追杀了九个月而已。”^②不管怎样，今天读陈友琴《俞平伯先生的趣味主义及其他》一文，对我们了解当年这段公案还是大有帮助的。

1955年，陈友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6年，文学研究所隶属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中国科学院。^③这时，文学研究所已发展到119人。^④文学所附设在北京大学时，北京大学放寒暑假，文学研究所也相应有一二十天休假，划归中国科学院后就取消了。但那是一个斗志昂扬的年代，好像没有谁会在意这一点，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统一上下班，一同参加民兵训练、群众性欢迎外宾等各种活动。^⑤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随后，中国科学院进行了第一次职称等级的评定。文学研究所只有钱锺书、俞平伯、何其芳三人被评为一级研究员，陈友琴评为六级副

①石昌渝《政治介入学术的悲剧——对一九五四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思考》，《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

②胡明《“红学”四十年》，《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

③1955年9月，中宣部批文，同意文学研究所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领导。1956年1月，文学研究所在领导关系上正式转为隶属中国科学院。

④据文学研究所1958年8月编印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概况（1953年～1958年）》。

⑤直到1962年8月9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改进工作的意见》（修订稿）完成，才明文规定：“取消研究人员的统一上下班制度”。“研究人员同编辑人员可以不参加民兵训练活动，不参加群众性欢迎外宾活动。行政办公室和所内外其他工作机构，工作人员，不经过所领导的批准，不得耽误研究人员的工作时间，派他们进行研究工作以外的活动。”

研究员。1956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撤消，其主办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周刊）正式改由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主办，陈翔鹤继续担任主编。1956年秋，文学研究所由北京大学迁至中关村，陈友琴继续在古典文学组从事研究。同年12月17日至25日，文学研究所就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两组论文，在北京大学临湖轩召开第一次全所的科学讨论会。一组是关于鲁迅的论文；另一组是关于《红楼梦》的论文，有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和曹道衡的《关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及其与〈红楼梦〉的关系》（何其芳审阅初稿）。1958年3月，因“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已成为独立的单位，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因此，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何其芳、党支部书记唐棣华向中国科学院党组递送请示报告，请求“除在行政上仍隶属于中国科学院，由科学院和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各方面继续领导而外，在政治、思想、业务方面同时请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中国科学院档案处藏档案）。从此，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步调开始同中宣部协调起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意识形态部门。不仅日常研究要密切配合现实，而且中、长期工作也纳入规划中。

1956年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召开，1月至3月，文学研究所讨论通过《关于发展文艺科学和培养文学研究人材的十二年计划的初步意见》及《文学科学远景规划草案》，所长郑振铎提出编写大文学史的要求。1957年2月，为了配合大文学史的编写，中国古典文学组和中国文学史组改组为先秦至宋和元明清文学两个研究组。那是一个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的春天，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只是好景不长，随后就是整风、反右，“拔白旗，插红旗”……春尽秋来雨未已，幸好这一切是慢慢到来的。1958年8月，文学研究所已有研究人员68人，编辑

人员18人，助理业务人员23人，行政人员16人，共125人。^①1958年10月18日，正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第四次郑振铎学术批判会之际，郑振铎率领的访问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中国文化代表团飞机遇难的噩耗传来，当时郑振铎正值六十耳顺之年。嗣后，由何其芳继任文学研究所所长。^②1958年10月底，正当大跃进如火如荼，一颗颗高产卫星上报的时候，陈友琴同杨绛、钱锺书、罗大冈、李健吾、王芸荪等到河北昌黎，参加为期两三个月的下乡锻炼，过五关（劳动关、居住关、饮食关、方便关、卫生关），“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改造自我”。1958年秋，文学研究所又一次进行研究人员职称等级的评定工作，陈友琴仍为六级副研究员。这一年秋冬之际，文学研究所由中关村迁至建国门，不久成立了资料室，由吴晓铃兼任主任，陈友琴兼任副主任，1959年4月由路坎接替。何其芳的设想是要把资料室办成全国的“资料库”，要为全国从事文学研究的工作者、大学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服务。而且不但收集国内的，还要收集海外汉学家研究中国文学的资料。1960年2月9日，周扬到文学研究所考察工作时，也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在这一思想领导下，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从百余种报刊中挑选重要论文，按专题和作家作品分类剪贴，迄今已积累5000余册的剪报资料。同时开始“大型文学评论目录索引”的资料收集工作。时间从1901年至1949年10月，跨度大约50年。另从1949年10月

①据文学研究所1958年8月编印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概况（1953年～1958年）》。

②1959年7月6日正式任命，见王平凡《深切怀念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同志》，收入《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11页。

至1959年10月跨度为10年，前后共60年。后来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五册。^①

陈友琴的代表作《白居易诗评述汇编》，就是在当时要加强文献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这一思想指导下展开的。请参见拙撰《陈友琴先生古典文学研究述论》（《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及《〈白居易资料新编〉刍议》（《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围绕《白居易诗评述汇编》的编撰，陈友琴先后撰写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其中比较重要、影响较大的是《白居易作品中的思想矛盾》、《白居易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这两篇长文。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国内涌现出多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和分析白居易及其创作成就的传记类著作。陈友琴撰写的《白居易》是其中出版较晚的，收入《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1961年12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尽管只有3.6万字，却是影响广泛的普及读物，多次重印。^②这是论说相对平实而准确的一部白居易传，在介绍

①《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0月~1966年6月》，中华书局，1979年11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66年7月~1979年12月》，中华书局，1982年5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80年1月~1981年12月》，中华书局，1985年10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82年1月~1983年12月》，中华书局，1988年9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84年1月~1985年12月》，中华书局，1995年7月。

②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5年12月第2版，3.8万字，有所修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5月新版第1版，1982年1月第2次印刷，4万字，收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台北：群玉堂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78年5月第1版；日本：日中出版社，1985年3月（昭和60年），山田侑平译本，收入“中国古典入门丛书7”；台湾：国文天地出版社，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将其与龚克昌、彭重光《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合订为《白居易及其作品选》；又有《唐代五大文豪》本。

生平的同时，也以专节分析评价代表作《长恨歌》、《秦中吟》、《新乐府》、《琵琶行》。其评述扼要简洁，语言通俗易懂，注释详细精当，而且在学术层面上，吸收前此著作成果的同时，避免了一些过于平面化、简单化的论断，因此今天看来，仍不失为一部值得推荐的白氏小传。

1959年4月10日，《文学评论》第一次编委会在北京召开，余冠英、陈友琴借便邀与会的夏承焘至文学研究所参观。^①上个月，文学所资料室刚刚购得高鹗批改的《红楼梦》稿本，引起大家的格外关注。同观者还有何其芳、陈翔鹤等。^②因为文学研究所已由中关村迁至建国门，所以，1959年5月15日，陈友琴也和许多同事一样，自中关村搬入东四头条胡同一号学部宿舍。邻居有余冠英、钱锺书等。这一年春季，中央书记处下达任务，资料室副主任陈友琴从何其芳那里接受了编辑《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初选工作。这本书是毛泽东交给何其芳的任务，主要是针对当时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和国内的天灾人祸，鼓励、教育全国人民不要怕世上的各种妖魔鬼怪。此书从我国古代的史传、笔记小说等书籍中选出若干有代表性的传说故事，表现了不怕鬼、不信神、不惧邪的思想，成为当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从中选了一部分故事，印发给到会同志。嗣后，又指示将编成的初稿精选充实，由何其芳撰写序文，公开出版。^③序文的初稿完成后，毛泽东两次约见何其芳，并亲自修改序文。1961年1月24日，序文定稿后，毛泽东又作了

①1946年，陈友琴任之江大学国文系讲师时，夏承焘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主任。

②见《夏承焘集》第七册《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082页。

③《不怕鬼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2月第1版，1978年10月第2版。

批示，要求在2月间出书，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序文的英文稿在《北京周报》发表。何其芳主持该书编选工作，古代组胡念贻、乔象锺、曹道衡、邓绍基等参加编写，陈友琴作了具体的编辑、注释工作。在酌定篇目、释文过程中，俞平伯、余冠英、钱锺书、孙楷第分别予以指导。出版后，陈友琴赠出不少样书，广泛听取意见。沈从文很喜爱这本书，在书上密密麻麻写满了眉批与加注，还把这本眉批加注本转送回陈友琴。

1959年7月，陈友琴的第一部论文集《温故集》，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友人陈向平的鼓励和促成之下，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这部13.9万字的集子收入《略谈〈长生殿〉作者洪昇的生平》等22篇札记、论文及考证文章，十有八九都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上发表过。除了前四篇是长文以外，其余篇幅都很短。其中与同行商榷之作颇多，正是当时学术界百家争鸣气氛的一个缩影。内容以唐诗（尤其是白居易）研究为多。这些或长多短的文章，是解放后作者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习古典文学，分析故书旧学的产物，所以名之为《温故集》。总体看来，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仍富有参考价值，可供今天的研究者温故而知新。

随着1959年“学术批判”运动的展开，由各高校大学生们集体编写的文学史纷纷出版，1960年年初前后，文学研究所也开始着手编写《中国文学史》，所长何其芳提出三点“基本要求”：（1）材料翔实；（2）论点妥当；（3）文字精炼。还要“有一定的见解”。^①

^①据《文学研究所内部材料（1953~1965）》。参见邓绍基《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编写经过》，收入《岁月熔金：文学研究所五十年记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第239页。

他特意请人翻译了《英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苏联文学史》的目录和泰纳《英国文学史·序言》作参考，要求学习苏联布罗茨基的《俄国文学史》的写法。1961年10月，列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属各所1961-1962年重点专著计划目录》的《中国文学简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出征求意见本，署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小组编写”，正式出版时才改名《中国文学史》。那时还没有抛弃大跃进时急躁的情绪，提出了“三年计划一年完成”的口号，还在全所大会上表了决心。尽管遇上“反右倾，鼓干劲”的运动，耽误了一些时间，但一年完成的设想基本上实现了。征求意见稿付梓后，编写人员分赴上海、南京、济南、河北和天津等地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征求意见，初稿完成后，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时候，编写组中不少人减了粮食定量，都有些浮肿。所领导考虑就这样坚持工作，恐怕很难完成，因此安排编写组到颐和园西边的中央党校招待所，集中修改文学史。在那里住，可以在食堂就餐。大约所里付一些钱，党校可以对每个人每月多供应几两肉和蔬菜。所以1961年那年，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编写组成员倒还过得去。在中央党校修改文学史，大约也整整花了一年时间，直到1962年春节以后才回到城里。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经过修改，一些偏激的评价被改正了，比1960年的稿子论点要平稳。^①1962年4月，《中国文学史》出版内部铅印本，署名“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1962年7月，在建所十周年之际，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古代部分共三册，从上古写到鸦片战争（1840）为止。余冠英担任全书总负责人。18位同志参加编写。编

①见曹道衡《困学纪程》，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第114页。

写说明里说，执笔时曾分为三个小组进行：上古至隋段（即第一册）由余冠英兼任主持人，胡念贻、曹道衡、刘建邦（1960年启动时下放农村，修改定稿时参加）参加上古至隋段的编写工作；唐宋段（即第二册）由钱锺书主持，力扬、陈友琴、乔象锺、蒋和生、吴庚舜、王水照参加；元明清段（即第三册）由范宁主持，吴晓铃、陈毓黻、刘世德、邓绍基、梁共民、徐凌云参加。其实陈友琴不仅参加编写了唐代部分章节，也参加了清代的部分章节。这部文学史的总体特色是资料扎实，观点稳妥。出版后，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史研究工作的一大收获”，在国内文学史界一直产生着较大的影响。《中国文学史》正式出版的第二年，陈友琴由六级副研究员提升为五级副研究员，工资由149.5元涨至177元。

1966年至1979年，陈友琴和其他学者一样，进入学术冬眠期。从发表《重读舒位〈瓶水斋诗集〉》一文（《光明日报》1965年6月13日《文学遗产》512期）以后，直到《略论清代初期诗坛上的南施北宋》（《河北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国内再也找不到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文革”期间，陈友琴还因所谓历史问题，受到留党察看处分，两年后解除处分。^①1969年至1972年，前后三年，同在文学研究所其他人员一样，下放河南罗山、息县、明港等地的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在干校里，有一天，有人和钱锺书开玩笑：要他以钱锺书的字，对一个“姓名对”。他们以为这是奇招，可以难倒他。谁知钱锺书连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陈友琴”。又有一天，一位从北京探亲回到河南息县干校的同志告诉大家：北京传说陈友琴已经死掉了。陈友琴听到以后大笑，立即写下一绝：

^①参见徐兆淮《我在“文革”专案组的日子》，《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